

专栏 Column

责任编辑:沈飞 美编:蒋玉磊 2006.6.15 星期四
邮箱:flyhow@ssnews.com.cn 电话:021-38967626

■胸中无剑



◎何帆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中心副主任

我在BBS上贴出了最近忙得应接不暇的行程:从一个地方飞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会议转到另一个会议。有位学生看到后,忍不住发了个回帖:

“Krugman在 How I work 中说明了:他从事一些与政策相关的工作,虽然对理论研究有诸多干扰(除了在无聊的会议上花费时间等等,他认为最严重的在于动摇原来的价值观),但也有相当的回报(包括对现实问题的了解和其他方面的学术积累)。何老师的日程安排如此紧凑,在这方面肯定也有一些感想。如何处理——学术研究和政策路线——这两种看似相容又颇具矛盾的工作内容?其他非学术性或准学术性的活动,是否占用了您太多时间?甚至对您的价值观是否产生过影响?”

我可不跟Krugman比。我之所以这样忙,主要还是因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人是有意志自由的,他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比如,你可以选择做一颗螺丝钉,也可以选择不做螺丝钉。但是,一旦你选择做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就没有办法去选择螺丝钉运转的速度。我就是整个学术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杂志要出版,学生要答疑,课题要交差,报纸的约稿已经到了截稿日期,一旦机器运转下来,你想停是停不下来的。

不过,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优化资源的配置还是可以做得到的。穷人最懂得节俭。时间不够用的人对如何利用时间也最有体会。海伦·凯勒说:“急事求忙人”,也是这个道理。不敢说我已经知道如何最有效地利用时间,但是有些经验是通过试错法得到的,或许值得和朋友们交流。

先说收益最低的活动。我认为接受国内媒体采访,以及接待投资银行介绍来的客户。说这话我颇费踌躇,因为我有很多媒体和投资银行界的朋友,且保持着密切的往来,但这靠的是友情的联系,而非公干,希望他们不会对我的狂妄生气。坦率地说,我对国内媒体比较失望。很多记者缺乏敬业精神,不认真做采访前的案头准备,而且似乎特别迷信专家。据我所知,国外的经济学家很少像国内的经济学家这样频繁地在媒体上露面。我在MIT访问的时候,看到一个教授在他的工作室外边贴出一张剪报,是当地的一家报纸在采访的时候引用了他的观点,只有一句话的篇幅,但这个老兄用鲜亮的荧光笔标注出来,以示重视。像Stiglitz这样有名的经济学家,参加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时候也无非和我这样的无名小辈在一个圆桌上发言,但是《纽约时报》专栏作家Thomas Friedman在早上发表首场演说和比尔·盖茨同台对话。国内的记者朋友们应该立志在影响力方面超过我们这些所谓的专家,而不是随便打一个电话,问一两个无聊的问题应付采访任务。

由于中国经济越来越热,我时常会接待一些投资银行的客户。一开始我觉得这是一种光荣,是自己得到认可的象征,后来才忽然意识到,别人之所以采访我不是因为我比他们更出色,而是因为他们比我更聪明。采访是为了从别人那里得到知识和信息,接受采访是免费给别人提供知识和信息。好比中国经济,过去老是强调出口,不愿意进口,这是很愚蠢的,因为出口是别人在借用你的资源,进口是你去利用别人的资源。我们都要学习如何去采访,学会善于从别人那里得到信息。

那么,哪些是收益最大的活动?如果按照得到信息的多少来衡量,我比较喜欢那些政府部门针对性很强、很务实的工作会议。国外的学术会议也不一定都是信息量很大的,那些题目很具体的会议往往收获更大。除了看会议的主题,还要看参加会议的人,即使是会议的主题非常枯燥,但是在会下有很多交流,仍然可以从国外的同行和朋友那里得到很多新的观点和信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我听的几个专题报告会都了无新意,有趣的是,在那里可以见到各色人物:Google创始人、非洲某个国家财政部长、柬埔寨妇女运动领袖、突尼斯报纸主编等等。了解别人的世界,听听别人的看法,知道一些自己闻所未闻的东西,这是我最喜欢的。

哪些是我最难取舍的活动?如果是给EMBA或是给金融机构上课,经济收益可能更高,但是如果是给高校的学生开讲座,社会收益可能更高。那些能够支付高额学费的企业家和金融家实际上并没有多少需要从我这里学习的,但是他们领悟力很强,能够从我的瓦砾中找到他们需要的闪光的东西。作为一个经济学教育者,给学生上课,尤其是给大学的新生上课,可能是边际收益最大的。我至今引以为自豪的,几乎我每一次讲座都能够激发一部分学生对经济学的热爱。让更多这样的有热情、有理想的青年迷恋上经济学,经济学的进步就更快。当然,这类讲座的报酬是远远不能和商业演讲相比的。

我的朋友钟伟有一句名言:有很多事情要做的人是可耻的。我深以为然。到目前为止,我仍然过着可耻的生活。忙不代表成功,忙代表着我随波逐流和日益堕落。

学者需要这么忙吗?



◎周兴维

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往事并不如烟。自1978年底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农民在过了一段不是太长的“好日子”后,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种种成果或“改革红利”就与农民无缘了。及至21世纪,农民不仅不能分享中国改革的成果,反而不得不为新的改革而额外净付出。结果,昔日支撑中国改革成功的最强韧、最坚韧的脊梁,如今却几乎只剩下副最虚弱、最瘠薄的躯壳,所谓“三农问题”也愈演愈烈,社会正义问题空前突出。也正因此如此,人们才会从2004年到2006年连续看到三个“一号文件”,看到国务院对农民工的关注,看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勃兴。这是一个信号:“共同富裕”的思想终于又回到了宏观的“政策导向”和“激励机制”中。

然而,沉重的历史、严峻的现实昭示着人们,欲弥合当下中国社会已经产生的“阶层”裂痕和城乡裂痕、社

■乱弹



◎周洛华

国泰君安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并购部副总经理
上海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

“白娘子”是一位美丽的上海女性,也曾是中国证券市场上的第一代红马甲。因为嫁给了我的好友“白大侠”,故而被称为“白娘子”。她不仅是中国资本市场的“过来人”,还是许多股民起伏沉浮经历的见证人。据说白娘子是当年上海最早的证券营业部的“股花”。她坐在柜台后面,红颜回眸,一瞥一瞥,曾经使无数英雄竞折腰。另据传说:当年拥挤在营业部炒股票的人中,有一大半是带



新@时代

■大局

没有新农民 难有新农村

会裂痕,就必须把“共同富裕”纳入具体的可预期的也即稳定的制度安排中。只有让“共同富裕”制度化,切实减少农民,才能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共同富裕,这亦关乎中华民族的振兴和百年强国梦的实现。否则,“共同富裕”就会局限在技术层面乃至停留于道义层面或人格层面而流于形式。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自1949年迄今,我们有过许许多多的英明抉择,也有不少不甚英明的抉择,还有少数很不英明但却具有“重大、深远历史影响”的抉择;而在所有很不英明的抉择中,最不英明的抉择当属人口政策、教育政策和收入政策的失当失措——人口,农村最多;文盲,农村最多;穷人,农村最多。近些年来,由贫困人口和低收入阶层构成的“弱势群体”有扩大的趋势。从社会公正和社会正义市场经济的宗旨出发,讲“关注弱势群体”,首要的是农民问题。中国农民人数最多,但自主能力和组织程度却最低,他们的权利、利益,往往系统地、持续地遭到侵犯和损害,构成了当今中国经济社会问题的本质和要害。从我国GDP构成与就业构成的对比看,农业的GDP占比不足20%,非农产业占比80%以上,但农业的就业占比却高达50%(西部地区一些地方在70%以上)。若全

国劳动力以9亿计,则至少有4.5亿劳动力就业于农业。撇开耕作技术和农业结构不谈,我国目前耕地最多容纳2亿劳动力,也即农业剩余劳动力在2.5亿左右。若全国劳动力以7亿计,则至少有3.5亿劳动力就业于农业,仍以我国目前的耕地最多容纳2亿劳动力计算,则农业剩余劳动力在1.5亿左右。

总起来说,减少农民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就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和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发展态势看,这一趋势将更加明显、突出,正不可阻挡地冲击着传统的“二元”体制。若“二元”体制不加快改革顺应这一趋势,其后果殊难预料。比如一年一度的“春运”,实际上是中国经济社会的一个极大的不幸。与其耗费那么多的人力财力物力去“春运”,不如多下些功夫化解这个“冤大头”更有利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增长和谐。又比如所谓“民工经济”,实际上是中国“二元”体制的一个怪胎,其直接害处是使民工永远低人一等(笔者在四川成都的零星调查中发现,民工几乎没有享受五个一劳动节休假的),而其深层害处则是使中国经济长期呈低水平结构增长。不减少农民,不打破“民工经济”的怪胎,提升中国的产业结构和产业结构以建设循环经济、环境友好节约型社会就是一句空话。

不可否认,政策驱动迄今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政策驱动绝非基础性动力;撇开经济增长的利益机制不论,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制度因素或制度驱动才是更为基本的动力。具体地说,增加农民收入,即使可以不考虑“因人而异”或“因人制宜”的情况,财税、价格和收入等政策的功效也是有限的,并且难以持续、配套、协调、长久地贯彻实施下去。尤为重要的是,作为发展环境,政策若不能系统地提升到制度建设、制度规范的高度,就很难使人们产生稳定的预期。事实上,在经历了二三十年的市场化改革之后,把政策性因素转化为制度性因素,把政策驱动转化为制度驱动,势在必行。

简言之,国民收入中“弱势群体”农民的初次分配很差,再分配当更差,遑论“三次分配”。不合理的价格、户口、农地(特别是表现为“征用”的农地使用流转)和教育政策加重了农民负担,限制了农民致富,成为“三农问题”的制度症结。局限在“三农”圈子中“三农”,中国不可能获得持续的经济和社会和谐。新农村建设必须造就新农民:人口,农村最少;文盲,农村最少;穷人,农村最少。如此“解放农民”,减少农民,以制度化形式实现中华民族的共同富裕,将是21世纪中国最英明的抉择。

本市场刚刚开始热热闹闹的年代,一批年轻人热烈地向往着未来会更好,生活会更幸福,他们都认为赶上了资本市场发展的大好时代,对未来、对人生、对国家都充满了乐观的预期和向往。经历了从恢弘壮阔的理想到惨淡灰暗现实的巨大强烈的人生跌宕后,如今,他们中的许多人已不知所踪。

我并不同情这些炒股失败的大户们,但是,不可否认,是他们用自己辛苦积累的财富,热情洋溢的青春和满怀豪情的理想为我们踏出了一条曲折的道路。他们的经历证明了资本市场的运作应该始终遵循着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原则,而不应该掺杂其他诸如为困难的国有企业融资、为政府解决资金来源、为银行承担劣质企业的信用风险、为庄家提供炒作的平台等等目的。

Trust but Verify(信任,但要核查)



◎刘贤方

美国理工大学(NY-IT)商学院副教授、终身教授,负责学校的中国MBA项目,兼任中美一些大公司顾问

那是1987年,在美苏中程核武器协议谈判时,里根旁敲侧击,对戈尔巴乔夫说,他最喜欢一句俄国谚语:“Trust, but verify(信任,但要核查)。”意思是,他相信苏联领导人的承诺,但还必须有个有效的验证机制。那时他大概没有预期这句话会成为英语世界的一句不朽格言。

这让我想起一个朋友的亲身经历。她是一家总部在深圳的超市集团公司老总。她在澳大利亚的朋友要在香港买房,需要借个香港账户把钱汇过来,就请她帮忙。那时她儿子正在香港读书,请了个当地保姆照顾。为了图方便,她就借了那保姆的账户。岂料当她朋友把五十万美金汇过来后,那个保姆突然消失了……结果是她赔了这笔钱。“就算白干了一年吧,”她苦笑地说。

“可你为什么如此信任那个保姆呢?”我不仅不解,甚至觉得难以置信。

“我看她是拜观音菩萨的,非常虔诚,就相信了她。”

在我看来,这便是中西文化的差别。中国儒家传统文化认为:“人之初,性本善。”有问题,就靠思想教育,提高觉悟来解决。而西方的文化基础是基督教,它的核心是原罪论,认为人生来就是有罪的,且因罪孽之深重,不是靠行善就能修成正果的——人的拯救是靠信上帝后所得到的赦免。

所以,西方人相信“绝对的权力就是绝对的腐败(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必须通过制度去制约。在政治制度设计上的分权和制衡,就是为了限制个人的权力。在经济上也是如此。当公司的组织形式产生于西方,就发生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也出现了管理者滥权的可能。那是靠制度的设计去制约:公司的管理在职业经理,但他们又受制于全体股东选举产生的董事会。董事会代表股东利益,去监控高管阶层——所以,董事长的任务不是去管理,而是去管理那些管理的人,以防止他们滥用职权。

制度的科学性带来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发展。但是,一切都以时空为转移。那些当年为资本主义经济奠定基础的制度设计者们不会想到,他们的精心设计,在随后的发展演变中,却成了藏污纳垢的避难所。

早在1932年,伯勒和敏(Berle and Mean)就提出股权与管理权分离所带来的问题。莫森和道斯(Monsen and Downs)在1965年一文中更是明确谈到,随着公司规模的发展,股权越来越分散,为数众多的小股东拥有主要股权,可他们单个势单力薄,在股东大会表决中无足轻重,大多也就不去投票。这使得那些不拥有,或只有少量股份的高层管理,能通过代理表决权(Proxy Rights)而控制董事会和公司,那将导致他们权位的自我延续(Self-perpetuation)、公司经营偏离股东利益最大化的

目标。最后,再回到开始的议题,人之初到底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呢?我认为没有必要讨论,因为那是没有结果的。基于人心邪恶的假设,西方社会千方百计地通过制度设计去制约,长久以来反而把人都管成了谦谦君子。美国人为什么如此在意个人信用?因为有全社会的个人信用体系,一旦有不良记录,以后贷款、买车、找工作,可以说寸步难行。如果说,邪恶之心人皆有之,没有必要制约,那连好人都会被“惯”坏,不仅会造成自己的损失,也害了对方,如以上那个保姆的例子。

中国从经济改革开始也出了不少问题,根本原因在过分强调扩大自主权、调动积极性,却忽视了监控,有效的管理体系不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而是“信任,但要核查。”两者缺一不可。

遥想当年“白娘子”

单谈论国有资产的做法只是在现有的蛋糕上切出更大的一块分配给国资委。从这个意义上讲,国资委不应该仅仅代表上市公司的国有成分,而应该成为广大中小股东的代理人,以严格的监督机制促进企业发展,共同做大一块蛋糕。

我相信今天我们即将迎来中国股市崭新的发展机遇,像我这样新近加入股市的人,以及像白娘子这样从十多年股市沉浮中顽强生存下来的人,都是幸运的。我们今天能够稍稍乐观地展望未来,却不能忘却那些曾经在我们身边一同悲喜的人们。他们的故事渐渐被人淡忘,但是造成他们无言结局的根源始终值得我们去反思。如果中国资本市场即将迎来一场盛宴的话,上述文字就算是我代表那些从股市消失的股民想说的话。因为他们今天不能来了。

(本文描述的人物均已隐去真实姓名)